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论文集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论文集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论文集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论文集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论文集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论文集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论文集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论文集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论文集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论文集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论文集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论文集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论文集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论文集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论文集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论文集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论文集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论文集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论文集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论文集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论文集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论文集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编著

奋发荆楚

探索文明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论文集

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

主 编 陈振裕

副 主 编 李天元 杨权喜

编 委 会 (按姓氏笔画为序)

王红星 李天元 陈振裕

杨权喜 笄浩波

执行委员 李天元 杨权喜 笄浩波

奋发荆楚
探索文明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论文集

目 录

前 言	陈振裕	(1)
湖北郧县曲远河口人类颅骨的形态特征及其在人类演化中的位置	李天元 王正华 李文森 冯小波 武仙竹	(14)
郧县人遗址发现的石制品	李炎贤 计宏祥 李天元 李文森 冯小波	(24)
从哺乳动物群看郧县人的时代	李天元 武仙竹 李文森	(46)
论大溪文化	孟华平	(58)
论屈家岭文化形成的年代和主要成因	林邦存	(74)
石家河文化初论	王红星	(83)
试论三皇五帝的谱系、时代与考古学文化	潘佳红	(111)
湖北商文化与商朝南土	杨权喜	(115)
湖北省商代考古发现与研究概述	冯少龙	(122)
盘龙城的考古发掘及其文化概貌	陈贤一	(127)
曾侯乙墓丧葬观试析	梁 柱	(135)
东周楚城初探	陈振裕	(144)
楚鬲研究	张昌平	(161)
湖北宜城罗岗车马坑的几个相关问题	笄浩波	(184)
包山 2 号楚墓饰棺连璧制度补说	黄凤春	(190)
包山 2 号楚墓所见葬制葬俗考	胡雅丽	(196)
从考古发现看楚国的发展与楚文化影响区域	王凤竹	(204)
战国楚简概述	胡志华	(210)
楚简文字杂识	刘国胜	(216)
湖北先秦建筑考古综述	李德喜	(221)
试析楚国车马坑	黄文新	(229)
楚国的几项科学技术与域外文化的比较研究	后德俊	(241)
江陵凤凰山汉简所反映的俑类随葬状况	丁 华	(251)
湖北宋墓分期	黄义军	(257)
酒器源流刍议	方秀珍	(263)
采用加温矫形新工艺修复商代大铜鼎	胡家喜	(269)
古墓葬考古发掘中的文物保护技术	李 玲	(273)
三峡地壳抬升与三峡水库修建后长江中、下游环境变化	武仙竹	(278)
后 记		(283)

前言

陈振裕

在举国欢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50 周年,迎接澳门回归祖国之际,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也迎来了建所 10 周年的喜庆日子。回顾 10 年来湖北省文物考古工作,有许多重要的考古新发现,古建维修、文物保护修复、档案资料建设等方面都取得可喜成绩,考古资料整理与科学研究更是硕果累累,令人欣慰。我们编辑出版这本论文集,作为建所 10 周年的一份礼物。

湖北省文物整理保管委员会于 1949 年 10 月 7 日成立,次年改为湖北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并从 1954 年就开展考古调查、田野发掘和古建维修等工作。由此可见,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虽然正式成立较晚,但此前已开展了大量的文物考古工作。因此,在这本论文集出版之际,对湖北省 50 年的考古工作进行回顾,总结重要考古发现与研究成果;同时,在 20 世纪之末,对 21 世纪的湖北考古工作进行展望,都是十分必要和有益的。

一

湖北省在中国的中部,地处长江中游,东控吴越,西通巴蜀,南邻百越,北连中原。长江横贯东西,京广线纵穿南北,素有“九省通衢”之称。境内的四周群山环抱,中部平原地区的湖泊星罗棋布,气候温和,雨水充沛,土地肥沃,江汉平原是我国重要的粮仓之一。优越的地理环境,我们的先民们早在 100 多万年就在这里劳动、生息、繁衍,创造了光辉灿烂的古代文化,留下了丰厚的文化遗产。

古称楚地的湖北省,有着悠久的历史 and 璀璨的古代文化,许多历代重要的文化遗存和珍贵的文物,都曾在这里发现。这些考古发现,对于研究湖北乃至中国的古代文明,都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价值。通观湖北 50 年的考古工作,可大致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50~60 年代初,是湖北省考古工作的初创时期。解放前湖北省没有开展考古工作。自 1954 年开始,在配合城市建设和农田水利建设等方面,开展了一系列的考古调查与发掘工作,并有许多重要的考古发现。这个时期对楚都纪南城和盘龙城商代遗址等进行考古调查,在武昌、鄂州发掘近千座六朝隋唐墓,对京山屈家岭遗址、天门石家河遗址、郢县青龙泉遗址进行考古发掘。由于当时人少任务重,研究工作相对滞后,仅由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主编的《京山屈家岭》考古专著问世。

第二阶段,1965~1977 年,系湖北考古的发展时期。这个时期的考古工作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以配合长江葛洲坝、大冶铜绿山矿冶等大型工程以及农田水利工程开展工作;二是为了解一些学术课题而进行的主动发掘,其中较重要的是在盘龙城与纪南城开展大规模的考古发掘。这些考古发掘有许多重要发现,并以黄陂盘龙城遗址、大冶铜绿山古矿冶遗址、楚都纪南城、江陵望山与沙冢楚墓、雨台山楚墓群、当阳赵家湖楚墓群、云梦睡虎地秦墓、江陵凤凰山秦汉墓等等,在国内外都有较大的影响。同时抓紧考古资料的及时整理,较快地发表了发掘简

报,并编写发掘报告,对相关的学术问题进行研究。

第三阶段,1978年至今,即改革开放以来,是湖北省考古工作的健康发展时期。这个阶段的考古工作与第二阶段基本相同,也是配合基建与主动发掘两个方面,并以配合基建工作为主;但也有一些差异,例如在配合基建方面,是以长江三峡工程坝区、库区,清江隔河岩、高坝洲、水布垭,宜(昌)黄(石)线、京(北京)珠(海)线、黄(石)黄(梅)线、汉(武汉)十(堰)线、襄(阳)荆(州)线等高速公路;以及荆(门)沙(市)线、京(北京)九(龙)线、长(江埠)荆(门)线等铁路的大型建设为主;同时,注意在配合基建工程围绕课题开展工作,以长江三峡工程为例,考古工作是围绕新石器时代的考古序列、巴文化与楚文化及其相互关系等学术课题为主进行的。主动的考古发掘项目,学术目的性更明确,如郧县曲远河口遗址发现“郧县人”头骨化石后,是围绕探索人类起源开展工作;天门石家河遗址是为了解原始社会的聚落形态而进行大规模考古发掘的。中日合作发掘的江陵阴湘城,是为了解史前城址的情况而进行的。为了探索早期楚文化,在鄂西沮漳河流域、襄阳地区开展了一系列的考古调查与发掘工作。这个时期的重大考古发现主要有:“郧县人”的曲远河口遗址、江陵鸡公山遗址、宜都城背溪遗址、天门石家河遗址群及六座史前城址、随州曾侯乙墓、出老子楚简的荆门郭店1号墓、包山楚墓、楚国“丝绸宝库”的江陵马山1号墓、张家山汉墓等等。这个时期的科学研究工作空前活跃,不仅发表了数以百计的考古发掘简报,而且对许多考古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发表了1000余篇论文,出版的专著30余本,并有20余本已完成初稿或送出版社待刊,可谓科研成果丰硕。出成果、出人才,全省的文博队伍不仅壮大了,业务素质与政治素质都有很大的提高,不仅有一批有经验的老专家,而且许多年轻学者脱颖而出。

二

建国50周年来,荆楚大地有许许多多重要的考古新发现,考古工作者的辛勤耕耘使研究工作不断深入,再现这块热土光辉灿烂的古代文明,并使湖北跃居为我国的文物大省。

探索人类起源和演化问题,是湖北旧石器时代考古的重要学术课题。1956年在长阳县下钟家村出土一件早期智人的上颌骨化石,次年又发现一颗牙齿化石,以及共存的动物群,这是中国南方首次发现的人类化石,说明湖北境内很早就有人类生息繁衍。1969年以来,考古工作者先后在湖北的西部、东部和西北部等地进行了考古调查和发掘工作,并取得了可喜的成果。目前考古调查的旧石器时代遗址和地点,在郧县、郧西、房县、神农架、丹江口、襄阳、江陵、长阳、建始、宜都、枝江、大冶等全省范围都有发现,初步统计达200处以上。许多地点还进行考古发掘,获得了人类化石及其大批共存的动物群和打制石器,而且旧石器时代早、中、晚三个不同阶段文化的发展序列较为清楚。

1969年以来,多次对建始巨猿洞进行发掘,出土了大批巨猿牙齿化石及共存的动物群化石。1975年在郧县梅铺龙骨洞发掘,出土古人类牙齿化石4枚,1976—1982年在郧西神雾岭白龙洞发掘,出土古人类牙齿化石8枚及其共存的动物群。这两个地点的地质年代均为早更新世晚期。郧县人遗址是1989年文物普查时发现的,1990年以来进行了6次考古发掘,出土保存基本完整的人头骨化石2件,在我国尚属罕见;还发现共存的石制品300余件,动物群化石包括6个目28种共1000余件,是我国旧石器时代的一次重大发现。人头骨特征较原始,属直立人类型,简称“郧县人”。石器以砾石石器为主,石片石器很少;石器类型以砍砸器为主,但也有少量典型的尖状器;加工方法以单面加工为主,少数器物为两面加工。动物群的性质与

陕西蓝田公王岭动物群相似,时代应为早更新世晚期。古地磁测年结果为距今90万~80万年,文化遗存属旧石器时代早期。

旧石器时期中期,经发掘研究可确定的主要有长阳下钟家村、大冶石龙头遗址、宜都九道河遗址等等。大冶石龙头遗址共发现石制品80多件,其中砍砸器17件,刮削器10件,对这个时期中国南方旧石器的内容提供了一批重要的实物资料。九道河遗址出土石制品395件,包括石核、石片、砍砸器、刮削器四类,动物化石10余种。文化面貌与大冶石龙头一致。

属于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址,主要有房县樟脑洞、丹江口市石鼓村、江陵鸡公山等遗址。汉阳纱帽山附近发现人颅骨化石,为晚期智人,称为汉阳人。樟脑洞遗址,出土石制品近2000件及10余种动物化石。最重要的是江陵鸡公山遗址,1992年发掘面积达467m²,出土数以万计的石制品。文化层分上下两层,上层出土石制品近500件,绝大部分为小石片石器,绝对年代距今1万~2万年。下层发现有5处由砾石和石制品构成的椭圆形或圆形的重要遗迹,其南面有两处分布有大量砾石原料、半成品、石器和废料的石器加工区,其中石制品有尖状器、砍砸器、刮削器、石锤、石钻等,绝对年代距今4万~5万年。它将人类对江汉平原的开发历史提早到4万~5万年前。

湖北地区发现的数量较多的直立人和智人化石,说明湖北是研究人类起源和演化的重要地区。湖北省发现的旧石器时代石制品,数以万计,而且早、中、晚三个阶段都有发现。这些石制品具有华南地区的特点,但也有受北方旧石器时代文化的影响。因此,湖北旧石器时代文化的研究在我国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地位。

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的发现与研究,从20世纪50年代以来就是湖北考古的重要工作。目前新石器时代遗址已发现2000多处,并对其中百余处遗址进行田野发掘,有许多遗址还进行大规模揭露。50年来大量资料的积累和研究工作的不断深入,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面貌已较清楚,其主要成就可概括为两个方面:一是在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理论的指导下,基本建立了本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发展系列,并对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分期、类型、文化内涵与关系进行了深入的研究,确立了长江中游文化区的特殊地位。二是围绕聚落形态的研究课题,开展以屈家岭文化6座古城为中心的文明过程探索,认识到湖北地区在中国文明进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是中国文明的摇篮之一。

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京山屈家岭遗址的发掘及文化的命名为标志,揭开了湖北新石器时代考古的序幕。大约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基本上确认了几支代表性考古学文化。从总体分析,汉水以东和汉水以西的两个地区的文化面貌有较大的差异,并且有各自的发展轨迹。

汉水以西地区的田野发掘工作较多,已建立了一个比较完备的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发展体系,其文化的发展序列为城背溪文化、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石家河文化,在学术界已达到共识。在秭归朝天嘴遗址和柳林溪遗址,都发现城背溪文化与大溪文化的地层叠压关系,两者的承袭发展关系明晰,它们与洞庭湖地区的原始文化的关系密切。而屈家岭文化和石家河文化显然是来源于汉水以东地区,但都保留了部分地方传统。城背溪文化,是目前湖北发现最早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它以夹砂红陶为特色,多饰绳纹,典型器物组合为釜、钵、支座。主要分布于长江干流的宜都、枝江、宜昌、秭归、巴东,西达巫峡。还在麻城后岗遗址也发现了这一阶段的文化遗存。秭归东门头遗址新发现的太阳人石刻,丰富了城背溪文化的内涵。大溪文化以夹炭红衣红陶为特点,其分布范围有所扩大。可分为三峡地区的中堡岛类型与江汉平原西部的关庙山类型,前者以山地渔猎经济为主,后者以平原农业经济为主。江陵朱农台遗址,发现分布密集的圆形和方形灰坑,可能用作祭祀坑;房基中发现长方形台基式建筑,台基的护坡经火

烘烤成硬面,代表了较高的建筑水平。在杨家湾、柳林溪等遗址出土了大量的刻划符号,蕴含了大溪文化社会及中国文字起源的重要信息。

汉水以东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其发展序列基本为边畈文化、油子岭文化、屈家岭文化、石家河文化,并自成系列,一脉相承。在屈家岭文化时期,其势力空前扩张,几乎涵盖了整个长江中游地区,形成了由若干地方类型构成的统一文化共同体。石制工具向小型复合式演化,快轮制陶技术普遍推广,并新出现了冶铜、髹漆等等,反映了屈家岭文化时期的农业和手工业有了进一步发展。发现的6座古城和中心聚落,以及大型多间式排型建筑等,反映了这个时期社会结构的变化。在此基础上,石家河文化又有了进一步发展。其中屈家岭文化的筒形器遗迹、石家河文化的陶缸刻符、葬玉瓮棺和数以千计的陶塑艺术品等,为认识当时的社会性质、文化艺术和宗教思想等方面,提供了丰富的资料。

这些考古学文化,都具有独自的文化特点。同时,它们与周邻地区的文化也是相互联系与影响的。鄂西北地区,显示出中原仰韶时代、龙山时代文化与湖北地区文化之间相互渗透融汇的轨迹。鄂东南地区,文化面貌复杂,湖北地区与长江中下游地区的文化间的势力此消彼长,大致在大溪文化时期来自江汉平原的文化影响较大,而屈家岭时期则薛家岗文化向西扩张,从而形成了错综复杂的文化结构。

从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聚落考古工作受到重视。引人注目的成果是在江汉平原发现了一批以屈家岭文化城址为中心的聚落遗址,目前有关天门石家河、荆州阴湘城、荆门马家垸、石首走马岭、应城门板湾等6座城址。这些城址在位置的选择、城址的形态及营造方式等方面,都有明显的共性。这些城的面积大小不同,一般在78 000~240 000m²,其中石家河城址的面积达1 200 000m²,是目前我国发现的面积最大、年代较早的一座新石器时代古城,它的周围积聚30多个中小型遗址。从其发现的遗迹、遗物之丰富,文物之精美与文化之进步看,无疑已成为长江中游新石器时代发展的中心和代表,是聚落发展到一个新阶段的标志,对探讨中国文明的起源有重要的意义。

商周时期的遗址和墓葬,遍布湖北各地。从考古资料分析,这个时期的湖北地区的古文化与中原文化发生了此消彼长的历程。相当于夏代的湖北古代文化,受中原文化的影响非常深刻,这类文化遗存主要有石家河、六合、白庙子等遗址,其年代为二里头文化一二期,有的学者称为“后石家河文化”。稍晚阶段的文化遗存主要有黄陂盘龙城和江陵荆南寺遗址,其年代为二里头文化晚期。二里头文化下层阶段开始商文化的影响更加深刻,分布范围更广,东至黄梅意生寺遗址,西到江汉平原以及整个鄂东北地区。

1974年和1976年两次大规模发掘的盘龙城遗址,是这个时期的重大考古发现。盘龙城是我国南方地区首次发现的商早期城址,近长方形夯土城垣保存较好,城垣外有城濠遗迹。城内东北部的高地上发现前后排列在同一中轴线上的3座南北向宫殿基址,并发掘其中的2座。其中1号宫殿基址面阔39.8m,进深12.3m,经复原研究是座外设回廊、内分4室的重檐四阿式高台寝殿建筑。北距1号宫殿13m的2号宫殿,面阔27.5m,进深10.5m,经复原研究是座两侧开门的厅堂式建筑。这是我国最早发掘的2座商代早期宫殿基址。其建筑结构及平面布局与文献所记的“前朝后寝”的建筑布局相似。城外还发现手工业作坊区,平民与奴隶居住区,平民与奴隶主贵族的墓地,其中李家嘴2号墓是长江流域发现的第1座商代殉人的奴隶主贵族墓。墓葬与遗址中出土了大批珍贵的文物,其中大圆鼎、铜钺与近1m长的大玉戈等都是同时期最大的珍品。

商代晚期,商文化势力在南方大范围退缩,目前只在鄂东北少数地点发现之外,其他地区

的土著文化迅速发展。但是,这些土著文化的文化面貌并不相同,从目前的资料可大致分为鄂东南、江汉平原、清江流域和三峡地区,其延续的时间一直到西周早、中期,它们可能与百越、百濮、早期巴人等族属有关。这个时期还出土了大批铜器,其中不乏珍品,例如在崇阳白霓出土的铜鼓,为目前国内仅存的1件;另1件形制近似的铜鼓,现已流失到日本。

矿冶遗址的发掘是从湖北铜绿山古矿冶遗址开始的,已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收获,是中国考古史上的一次重大发现。在大冶、阳新、钟祥、鄂州、郧县等地,都发现了商周时期的古矿冶遗址。自1973年以来,先后在大冶铜绿山古石矿冶遗址进行了多次大规模发掘,清理出商代、西周、春秋、战国至汉代的不同结构,采用不同支护方法的竖井(包括斜井、盲井)数百座,大小平巷数百条,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具上千件。其中战国至西汉时期的矿井,在没有现代动力机械的生产条件下,用简单的铜、铁、木、石工具,把矿井掘至40~50m深,并且有效地解决了竖井、斜井、盲井和平巷相结合的开拓方式,还初步解决了井下的支护、通风、排水、提升和照明等一系列复杂的问题。已发现8座春秋时期的炼铜竖炉,基本具备了近代鼓风炉的式样。在竖炉旁出土的粗铜块,含铜量达93%以上;据测算,铜绿山古铜矿至少生产了10万吨以上的粗铜,为当时社会经济及文化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还发现40万~50万吨已成碎片状的古炼渣,表面光滑,渣的流动性能良好,平均含铜量只有0.7%,欧洲19世纪末叶才达到这个冶炼水平。显而易见,当时的开采铜矿技术已达到很高的水平。

西周早、中期,发掘了许多遗址和墓葬,揭示了周文化的全新面貌。但西周晚期以后,地方文化又迅速发展,鄂西地区主要是楚人控制的范围。西周和东周时期发现了许多有国名的铭文铜器,主要有楚、陈、江、黄、曾、蔡、越、吴、巴、北、濮、长、邓、息和魏等,反映了周王室分封诸侯及湖北境内小诸侯国林立的历史情况。

曾国铜器的发现最引人注目,迄今已有20余批。1967年京山苏家垅发现的“曾侯中子旂父”铜器90余件,是我省范围内首次发现的曾国铜器,也是我国最早发现的西周九鼎墓。1978年发掘的随州曾侯乙墓,是我国考古史上的一次重大发现。这座墓的墓主是战国早期曾国的国君,名乙,入葬于公元前433年或稍晚。它的规模宏大,面积达220m²。各种质料的随葬品达15000余件之多,其保存之完好,工艺之精美,器类之繁多,文字资料之丰富,都是同时期墓葬所罕见的。出土的9种125件乐器,种类齐全,数量之多,是迄今仅见的,并首次发现琴、排箫、篪等早已失传的乐器,这批乐器还全面地显示了我国先秦音乐艺术的高度水平;65件青铜编钟,至今尚能演奏古今中外的各种乐曲,堪称世界奇迹。用熔模铸造法制成的青铜尊、盘,代表了中国先秦青铜铸造的科学水平。二十八宿衣箱,是我国迄今发现记有二十八宿全部名称,并与北斗、四象与之相配的一件最早的天文实物资料,从而证明二十八宿起源于中国。还有大批瑰丽造型纹样的各种文物,是研究先秦美学的宝贵资料。丰富的文字资料,为湖北地方史的研究提供了第一手资料等等。1999年还在墓坑东侧发现5个器物坑,其中一坑出土青铜帐篷构件400余件,仍属这个时期首次发现。因此,曾侯乙墓的发现,有力地推进了这个时期的中国考古研究和湖北地区历史的研究。

楚文化的发现与研究,是湖北最重要的文物考古工作。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获得丰硕的成果,充分展示了独具特色的丰富多彩的楚文化,并使楚文化的发现与研究由20世纪50年代的湖南转至湖北,同时还有力地推动了楚学的研究,使楚文化在我国东周列国文化中的发现与研究首屈一指。

楚国最早的城市是西周时期的丹阳,目前尚未发现。东周时期的楚城,不仅是当时楚国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中心,而且这些楚城的兴起和发展,还与楚国的崛起、兴盛和衰亡有着

密切的关系。已发现的 10 多座楚城,分布于湖北省各地,其建造年代大多为春秋晚期之后。从这些楚城的性质分析,可分为都城、陪都、县邑和军事城堡等四类,构成了楚国多层次的网状体系。江陵纪南城的规模最大,面积达 16km^2 。1975 年以来进行大规模发掘,近长方形的夯土城垣保存基本完整,有城门 7 个(其中水门 3 个),城垣外有城濠遗迹,城内有 84 个大型夯土台基,城内的布局也有所了解。从西北城门发掘等资料确知其年代为春秋晚期至战国中晚期,公元前 278 年秦将白起拔郢后迁至河南淮阳,楚人在此建都达 200 余年。1979 年当阳季家湖楚城进行较大规模发掘,城垣规模较大,城垣外有护城濠遗迹,城内有一些建筑遗迹,出土遗物早于纪南城,有的学者认为它是早期郢都。但是,春秋晚期之前的楚国郢都在何处,学术界的意见分歧较大,但都缺乏考古资料证明,尚有待于今后更多的考古工作。

在潜江龙湾(西距纪南城约 50km),考古调查发现放鹰台、荷花台、打鼓台、陈马台、章家台、郑家台、华家台、小黄家台等 10 余个夯土台基群。1987 年和 1999 年先后对保存较高的放鹰台进行大规模发掘,首次发现了春秋时期楚国的大型宫殿基址,其性质可能是楚王离宫别馆。

楚墓分布遍及全省各地,已发掘的各种类型楚墓达 5 000 余座,在全国各省发掘东周墓以及发表的考古发掘简报、专著和研究论文的数量都是最多的。其中较重要的有春秋中晚期的当阳曹家岗 5 号墓、赵巷 4 号墓,战国时期的江陵望山 1 号墓、2 号墓和沙冢 1 号墓、天星观 1 号墓、2 号墓、马山 1 号墓、雨台山楚墓群、九店楚墓群、当阳赵家湖楚墓群、荆门包山楚墓群、郭店 1 号墓等等。考古调查发现,在楚都纪南城西边的八岭山和北面的纪山,分布着数以百计的有封土堆的楚冢,而且墓葬的级别越高,封土的规模越大。在纪南城北约 20km 的荆门纪山薛家洼,发现一处排列整齐的土冢组成楚国大型陵园式墓地。它由矩形台、祭坛、陪陵三部分组成,而且陵园的整体构造十分讲究。这处墓地以第一座大冢为中心,第二座大冢位于它的北面,其后为横 4 行、纵 10 行的排列整齐的 40 个有封土堆的小陪冢,布局幽深有序,气势磅礴,可能是某一代楚王的墓地。还在宜城罗岗发现一座 7 辆车、18 匹马的车马坑和江陵九店发现一座 1 辆车、2 匹马的车马坑。1994 年在荆门郭家岗发现一具保存完好的战国时期女尸,这是我国发现年代最早的古尸。

湖北各地发现的楚墓,其墓葬形制基本相同,随葬器物有许多共同特点,但也有一定差异。依据各地的文化特点的差别,分为鄂西地区、汉水中游和鄂东地区三大块。以江陵、当阳为中心的鄂西地区,是楚文化的中心地区,出土物大多为典型的楚文物,最具楚文化的特点。以襄阳为中心的汉水中游地区,是楚文化与中原文化交流的枢纽,其文化特点具有一些中原文化因素。以鄂州为中心的鄂东地区,大约春秋中期才为楚地,并与吴越接壤,其文化特点具有一些吴越文化因素。楚文化也有个发展过程,它不断地融合其他文化,变得更加丰富多彩。因此,湖北境内楚文化的文化特点,也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发展变化的。楚墓的年代分期,是楚墓研究的基础。湖北地区 5 000 余座楚墓出土的大批铜、陶器,其中有几座有年代可考的墓葬和纪年铭文铜器,许多学者自 70 年代末就开始这方面的研究工作。当阳赵家湖、江陵雨台山和九店墓地小型墓的发掘,又对富于时代变化的陶器进行分析研究,现已基本建立楚墓的年代学序列,即自西周晚期到战国中晚期可分为 7 期,各个时期的陶器基本组合与器物特征较明显。从总的时代变化分析,主要分为两大阶段:春秋时期楚墓随葬的陶器以实用器为主,只有少数墓随葬仿铜陶礼器为主;战国时期楚墓随葬的陶器则以仿铜陶礼器为主,也有少数墓出土少量的实用生活用器。各期的仿铜陶礼器与实用生活用器并不尽相同。

作为观念形态的埋葬习俗,是当时现实社会生活的一个反映。因此,一个墓葬的墓坑大

小、棺椁的多寡,随葬器物的品种与数量的差异,是与墓主生前的社会地位密切相关的。湖北发现的楚墓,大致可分为五个类型。第一类,多重棺椁的大型墓,随葬品丰富,主要有成套的青铜礼器,编钟、编磬、鼓等乐器。发现极少,例如江陵天星观1号墓,据墓中竹简所记,墓主是楚国的封君番(潘)勑,因此,这类墓的墓主身份相当于楚国封君这个等级。第二类,多重棺椁大型墓,随葬品丰富,主要有成套的青铜礼器,未见钟磬,只有鼓、瑟等乐器。发现极少,例如荆门包山2号墓,据墓中竹简记载,墓主是楚国的左尹邵旸,左尹是令尹的重要助手,主管司法工作。因此这类墓的墓主身份相当于楚国的上大夫这个等级。第三类,多重棺椁中型墓,随葬品较多,有成组的青铜礼器(战国时期还有成套的仿铜陶礼器),只有少量鼓、瑟等乐器。发现10余座,例如江陵望山1号墓,据墓中竹简记载,墓主是愷固,经分析研究为下大夫。因此,这类墓的墓主身份相当于下大夫这个等级。第四类,单棺单椁小型墓,随葬品较少,未见成组的青铜礼器(战国时期有成套的仿铜陶礼器),鼓、瑟等乐器也极少见。发现数量相当多,例如江陵马山1号墓,墓主身份为士。因此,这类墓的墓主身份相当于士这个等级。第五类,单棺或无棺的小型墓,其中单棺墓的随葬品很少,一般只随葬生活用具,战国早期开始也有些墓开始随葬仿铜陶礼器;无棺的小型土坑墓,绝大多数没有随葬品,但也有极少数墓还随一二件陶生活用具或兵器。发现最多,这类墓的墓主,是当时楚国社会的最下层——庶民这个阶层的墓。

东周楚国遗址和墓葬出土了数以万计的大批文物,大部分出于墓葬,而且楚墓的墓坑填密封性能较好的白膏泥,使丝织品、竹木漆器等有机物质得以保存。这些丰富的楚文物是研究楚国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等方面的重要实物资料。

东周时期发现的金属农具主要有铁锸、斧、铁口耒等,以及铜斧、镰等,数量较多。一些墓中还出土板栗、生姜、梅、藕、小茴香等水果与调料,以及牛、羊、猪、鸡、鱼等动物骨骸。它反映了这个时期楚国的农业是相当发达的,对牧、副、渔的多种经营也很重视。

湖北楚墓各期出土青铜器的形制与花纹的变化,是与各期青铜铸造技术的不断发展有密切关系的。数以千计的楚国青铜器,用途非常广泛,而且自春秋中期之后有其独特的风格,镶嵌樽、镂孔杯、人擎灯、带流杯、错金银龙首杖、错银辖、鎏金带钩、菱形暗纹剑、方形与圆形镂空双层龙凤纹镜、制作精巧的器盖等等,是其中的一些珍品。在用鼎制度方面,可能存在高级贵族沿用周礼的奇数鼎制,而中下层贵族使用楚国的偶数鼎制。墓中随葬兵器的葬俗较盛,种类与数量较多,反映了楚人尚武的精神。从大批的青铜器分析,楚国在铸造上已掌握失蜡法、分铸焊接、套铸法、复合金属工艺等先进技术,装饰上广泛采用直接铸纹、镶嵌红铜与绿松石、错金银、鎏金、贴金、线刻、器表硫化处理等工艺,反映楚国的青铜铸造已达到很高的水平。楚墓中还发现不少吴、越、魏、蔡等国的青铜器,对研究楚国与这些诸侯国的关系也是有一定意义的。

楚国的漆器工艺相当发达,在东周各诸侯国中是首屈一指的。楚墓出土的漆器达3000多件,主要有生活用具、家具、乐器、兵器、车马器、文书工具、手工艺品和丧葬用具等,广泛地应用于当时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漆器的制作方法,据不同质料与器形进行艺术加工。发现的近百种漆器,其造型千姿百态、琳琅满目,十分注重实用与美观相结合的法则。镇墓兽、虎座飞鸟、鹿等漆器,为其他东周列国所未见,可能与楚人信巫风气盛行有关。彩绘花纹繁缛多变,图案优美,线条勾勒交错,各种色彩搭配谐和悦目,并注意与造型高度统一。发现的漆器艺术珍品非常多,包山2号墓出土的一件彩绘车马人物奁,画面的4辆马车首尾相接,其间布满衣着神态各异的26人,车啸马嘶,前呼后拥,恭候欢迎,场面十分壮观;翠柳飘拂,雁翔长空,犬豕欢逐,写景状物,生趣盎然,是件不可多得的楚国漆画艺术瑰宝。望山1号墓发现的一件彩绘木

雕小座屏,在长 51.8cm、屏宽 3cm、座宽 12cm、通高 15cm 的小座屏上,巧妙地将透雕与浮雕的凤、鸟、鹿、蛙、蟒、蛇等 55 个相互争斗的动物,交织成生动的画面。手艺巧夺天工,是我国先秦木雕和漆器的代表作。

楚国的丝织品,在望山、包山和马山等楚墓中都有发现,其中马山 1 号墓是我国先秦丝织品的一次最集中、最重要的发现,也是我国考古史上的一次重要发现。发现品种齐全,衣物有锦袍、单衣、夹衣、单裙、锦绣(为我国首次发现)、帽、绋面麻鞋和缙衣,以及被、衿、握、帛目、质、镜衣、枕套等等。这些丝织品的织工精细,主要有绋、绮、罗、锦、纱、绢、丝和组等 8 大类。花纹有龙、麒麟、凤、鸟、飞禽、蛇、花卉、舞人等,千姿百态,非常美观。色彩有朱砂、茄紫、深赭、浅绿、茶褐、金黄、棕黄和绛红等,色泽艳丽。经分析研究,这些丝织品主要是楚地的产品,当时已掌握了饲蚕、缂丝、织造和练染等整套技术,而且达到相当高的水平。望山 1 号墓出土的 1 件石字菱纹锦绣,技法高超,是我国已发现年代最早的绵绣珍品,将我国锦上锦绣的历史提前 1700 年。

楚墓还出土大批的竹、木、钢铁、陶瓷、皮革、琉璃、玉石、骨等质料的文物,其中也不乏珍品。例如望山 1 号墓出土的大型错金银铁带钩,弧长 46.2cm,为全国之最。包山 2 号墓出土的 1 件缝衣钢针,系我国年代最早的钢针。此墓还发现一件木折叠床,由床身、床栏和床屉三部分构成,结构复杂,可以折叠的床为我国先秦时期所仅见。这些各种质料的文物,是研究楚国各种手工业发展水平和文化艺术等方面的重要实物资料。

内容丰富的战国时期楚国竹简,是研究当时楚国历史的重要文献资料。湖北 14 座墓发现战国楚简,字数达 4 万字以上,是我国发现战国时期简牍资料最丰富的地区。主要有望山 1 号卷、2 号墓、天星观 1 号墓、包山 2 号墓、郭店 1 号墓和九店 56 号墓。简文内容十分丰富,主要内容有文书、卜筮祭祷记录、日书、遣策以及老子等几部古籍。其中包山 2 号墓的简文首次披露楚国的司法程序和许多案例,还有历法、地理及楚人先祖老僮、祝融、媼禽等重要内容。郭店楚简包含多种古籍,其中两种是道家学派的著作,其余为儒家学派的著作。《老子》甲、乙、丙是迄今为止所见年代最早的传抄本,还有许多是已佚失的古籍。这批简文内容弥补了先秦文献之不足,对于中国先秦时期的思想史、学术史的研究具有极重要的价值。

秦代的历史非常短暂,20 世纪 50~70 年代初发掘的一些小型秦墓,或归为战国墓,或划为西汉墓。1975 年在云梦睡虎地发掘 12 座秦墓,发现 2 座纪年墓,即 7 号墓为秦昭王 51 年(公元前 256 年),11 号墓为秦始皇 30 年(公元前 217 年),为湖北及南方地区秦墓的断代树立了两个标尺。湖北地区的秦墓,其年代包括公元前 278 年秦拔郢并设置南郡之后的战国晚期和秦代两个时期。有的学者依据睡虎地这两座纪年墓为标尺,对以往湖北地区发掘的资料进行梳理,建立了秦墓的年代学体系,并确定了一批秦墓。

目前在云梦、江陵、宜昌、宜城、襄阳、鄂州、郧县等地发现近 200 座小型秦墓。这些墓为竖穴土坑墓,无封土堆和墓道。墓坑填土为五花土和白膏泥,葬具为木棺槨,可以看出受楚文化的影响;有些墓坑还有二层台和四角有足窝,槨盖板上置牛、马头骨和四角有灰炆等奠祭遗迹,具有关中秦墓的文化特点。绝大多数墓的出土物未见仿铜陶礼器和专供丧葬用的镇墓兽之类漆器,一般出土日常实用器,主要有秦式鼎、釜、蒜头壶等铜器和小口瓮、罐、釜、甑、孟、釜等陶器,这类墓的墓主族属为秦人或改俗后的楚人。还有少数墓仍随葬鼎、盒、壶和豆等仿铜陶礼器,为典型楚器,这类墓的墓主族属为未改俗的楚人。从这些墓的总体文化特征分析,受秦文化的影响是非常深刻,主要特点与关中地区秦墓基本相同,但仍受到楚文化的一些影响,形成了湖北地区秦墓的文化特点,而与关中及其他地区秦墓的文化特点存在一些差异。

秦代大量简牍的发现,无论是数量及内容之丰富,都居全国第一。1975年在云梦睡虎地11号墓出土秦简,内容非常丰富,共有《编年记》、《南郡守滕文书》、《秦律十八种》、《效律》、《秦律杂抄》、《法律答问》、《封诊式》、《为吏之道》、《日书》甲、乙种等10种。其中秦律占一半以上,在法律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1989年云梦龙岗6号墓出土150余枚秦简,主要内容有禁苑、驰道、田地、马牛羊管理等,并以律文为主,有些简文与睡虎地秦简相同,而驰道管理等则为首见。1993年江陵王家台15号秦简出土一批秦简,主要内容有《日书》、《效律》、《易占》等,《易占》简文证实《归藏》一书的存在、产生与流传。1975年睡虎地4号墓出土2件秦代木牍,内容为家信,为我国首次发现。牍文谈到秦统一六国战争的一些情况,其中有关兵士军需问题是现存史书并未记载。另外,还在沙市发现一批秦简。这些内容丰富的大量秦代简牍,是研究秦代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的宝贵史料。

这些秦墓的大批出土物中,漆器最引人注目。迄今发现的秦代漆器达20余种,500余件,保存基本完好等方面,居全国首位。在继承战国时期漆器制作的基础上,卷制与扣器的制作工艺有了进一步发展。漆器十分注重日常生活的实用性,楚国常见的镇墓兽等丧葬明器已未见,生活用器明显增多。造型艺术更加注意美观与实用相结合的法则,并日趋成熟。装饰纹样中未见狰狞恐怖的纹样,花纹图案优美。在许多漆器上有烙印、针刻和墨书文字,反映了秦代的漆器制作已有多道工序,并有“物勒工名”制度,以及漆器产地等情况。

汉墓遍布全省各地。在江陵发现6座西汉纪年墓,即凤凰山9号、10号和68号墓,毛家园1号墓、张家山247号和258号墓,还在房县乱葬岗、二龙岗、宜都和巴东发现6座东汉纪年墓,为建立湖北地区汉代墓葬年代学提供依据。已发掘的墓葬均为中小型墓,墓主的级别较低。西汉初至中期,仍沿袭秦(或楚)的竖穴土坑木椁墓的葬制,中型墓一般有封土堆和斜坡墓道,鄂西地区还有少数岩坑墓,夫妻异穴合葬;随葬品以日用陶器为主,中型墓还有漆木、铜器等。江陵凤凰山168号墓发现一具保存完好的男尸,对研究我国的医学史等方面有重要的学术价值。167号墓的棺饰保存完好,对了解当时的葬俗有一定意义。这两座墓的头箱内,木俑、车、船等模型明器排列有序,象征墓主出行时前呼后拥的场面。大约在汉武帝时期的葬制产生较大变化,夫妻合葬和多人合葬的家族墓地开始兴起,近年在三峡地区的秭归庙坪、卜庄河等地也有发现;随葬品以表现自给自足的庄园经济的明器日益突出。西汉晚期,开始出现小型砖室墓;东汉时期更为流行,墓葬形制更是多种多样;随葬品一般为一套日常生活用器和表现自给自足的陶明器。东汉时期,还在一些市县发现画像石墓和画像砖墓,画像石墓系由砖石混建的多室墓,画像内容简单,其风格与南阳地区接近。

湖北省15座墓发现西汉简牍,数量巨大,其中江陵张家山247号墓出土竹简达1200余枚。内容非常丰富,主要有遗策、告地书、律令、医学、算书、军事、历法、日书等等。张家山247号墓的简文内容有一半以上为汉初律令,包括有金布律、秦律、史律、均输律、贼律等20多种,使我们对萧何制定的九律有所了解。简文中还有《脉书》、《引书》、《算数书》、《奏藏书》、《盖庐》等五部佚书。其中《算数书》比我国现存的数学专著《九章算术》早300年,是中国数学史上的一次惊人发现。此墓与258号墓都出有历谱,是我国考古发现较早的历谱。凤凰山10号墓的简文内容有赋税、刍稿、贷种实、徭役、经商、遗策等,也是首次发现的。凤凰山168号墓的遗策简文中,记有当时使用家内奴婢种田情况。这些简牍的内容涉及西汉社会的各个方面,弥补了史书记载之不足,对研究西汉历史有重要价值。

湖北西汉墓出土数以千计的精美漆器,品种达30余种,保存完好。夹纻胎的漆器比秦代有明显地增多,许多陶器上也髹漆彩绘花纹。髹制技术的运用,是漆器制作工艺的一大进步,

不仅使器形更加规范美观,而且提高生产效率。在造型和装饰方面非常注重实用与美观相结合,并采用锥画和暗纹等新工艺,达到很高的水平。凤凰山 168 号墓的七豹大扁壶、三鱼耳杯、锥画圆奁、大圆盘、耳杯盒,167 号墓的鹤纹匜等等,是其中的珍品;光化 5 座坟出土的二件卮,是我国发现最早的鎏金漆器。张家山西汉墓发现我国年代最早的青铜虎子和制作精美的龙凤纹铜洗,凤凰山 167 号墓出土缝衣钢针、步弓模型明器和 4 束保存如新的稻穗。东汉时期,三峡地区的秭归和房县发现摇钱树,当阳等地出土早期青瓷器,云梦周田发现一座豪华的地方庄园住宅陶模型,并有我国最早的百叶窗。这些各种质料的随葬品,是研究汉代历史的重要实物资料。

六朝时期,在今鄂州市内的武昌城是孙吴首建都城的地方,又是两晋南朝武昌郡治所在,也是我国南方现存六朝古城中最早的一座。现存城址平面略作长方形,北临长江,其余三面均有夯土城垣,并发现城门 5 座,城垣四角发现角楼的夯土台基,南垣外侧发现“马面”的夯土台基,城垣外设城濠,城内采集的黑灰色筒瓦,或许就是武昌宫的遗物。武昌城址的平面布局以及军事设防的角楼和“马面”等,都是中国古代都城中较早的实例,对研究我国古都发展史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六朝时期的墓葬在全省范围内都有发现,并以武昌、鄂州两地最多。发现的纪年墓达 20 座之多,具有典型的断代意义。通过对武昌和鄂州近 600 座中小型墓的资料整理研究,建立了湖北地区六朝墓的年代学序列,并对墓葬进行分类研究,确定墓主生前的不同等级。鄂州鄂钢饮料厂 1 号墓的墓主孙吴宗室,是目前长江流域规模最大、墓主身份最高的一座六朝墓。在江陵、襄阳还发现两座南朝画像砖墓,其风格特点与河南邓州画像砖接近。

青瓷器是六朝墓中出土数量最多,最具时代特征的器物,主要有日常生活用具和模型明器两大类 30 余种。大批的青瓷器,除少数为长江下游的产品外,绝大多数具有地方特点,应为湖北地区生产的。圆体青瓷虎子、青瓷人顶灯、蛙形水注等是其中的珍品。鄂州孙将军墓的“孙将军门楼”和鄂钢饮料厂 1 号墓的青瓷坞堡等模型明器,反映了当时豪门大族府第的建筑情况。鄂州塘角头 14 号墓发现的 1 件釉陶佛像,是目前我国所见最早的佛像;过去还在武昌莲溪寺永安五年墓发现鎏金铜佛饰和 4 件“白毫相”俑,是研究我国早期佛教造像及佛教南传的重要资料。

六朝铜镜在湖北省内各地的墓中都有发现,仅鄂州等出土的铜镜总数达 200 件以上,其中纪年镜有 20 余件。铜镜类型以重列式神兽镜和环列式神兽镜为主,占全部铜镜半数以上,柿蒂连弧夔凤纹镜也占相当比例。鄂州发现这些铜镜,除少数为浙江会稽和吴郡的产品之外,绝大多数为武昌(今鄂州)所铸。古武昌铸镜业发展较晚,而生产的神兽纹镜和四叶八凤纹镜颇具特色,不仅在武昌大量流行,还远销到包括会稽在内的南方各地,是当时南方的铸镜中心之一。

隋唐时期的墓葬,基本沿袭湖北地区南朝以来的葬制和葬俗,在三峡地区还发现一些洞室墓。隋墓中画像砖和花纹砖更加普及,到唐代已较少见。武昌发现的隋唐墓最多,对 200 余座隋唐墓的资料整理研究,建立了本地区隋唐墓的年代学序列,对随葬的青瓷器分窑口进行归类分析是考古报告编写的重要突破,还对墓葬的类型进行全面分析。在安陆和郧县还发现等级较高的唐墓,其中郧县发掘的唐濮王李泰以及长子、妻和次子 4 座墓,是迄今除唐代帝陵之外一处重要的李唐王族墓地。这处墓地的墓葬形制,具有陕西唐代贵族大墓的特点;出土精美的三彩器和工艺上乘的金银器,也是唐代长安的产品。隋唐墓中出土的大量炊俑、伎乐俑等,具有浓厚的生活气息。

宋元时期,蕲春宋代罗州城发掘,印证了此城毁于战火的文献记载。湖北窑址发现较多,仅在梁子湖周围就有上百座之多。近年对江夏区青山窑和王麻窑等窑址进行发掘,首次揭示了本地区瓷窑的特点,填补了长江中游的空白。在黄石西塞山发现了一座宋代钱窑和一坛宋代银锭,其中钱窑内藏铜钱 110 000 余 kg,自西汉初至南宋淳佑十二年之间 1 400 余年的各个朝代的铜钱,为研究我国货币史提供丰富的资料。

宋代墓葬均为中小型墓,有土坑墓、石室墓、砖室墓、碗室墓、洞室墓、砖石混合墓等各种结构,汉水中游多为仿木结构的砖室墓,三峡地区发现一批洞室墓。各地还发现一批五代至宋代的纪年墓,具有断代意义。许多墓中还发现墓志和买地券。一般出土物都不太丰富,大多以瓷生活用具为主。在汉阳十里铺北宋墓出土 19 件夹氍胎漆器,为湖北襄阳产品。

明代墓葬较多,已发掘明首辅张居正墓等一批等级较高的墓葬。在钟祥、江陵、武昌和蕲春还发现一批藩王墓,其中钟祥显陵是明世宗亲生父母宪王朱佑元和王妃的合葬墓,将被列为世界文化保护遗产。先后发掘楚昭王朱桢墓、江陵辽简王墓和湘献王墓,出土大批金银器和金封册等文物,对研究明代藩王墓的葬制和葬俗有重要意义。

三

湖北的文物考古工作起步较晚,经过 50 年的不懈努力,已有许多驰名中外的重大考古发现,并在探索人类起源、聚落形态研究和楚文化研究等方面都取得了显著的成就,使人们对湖北地区的历史有了新的认识。在世纪之交的龙年,我们回顾 50 年来考古成就,不是为了感到自豪而固步自封,而是为了认识到任重道远,必须更加振奋精神迎接新世纪的挑战,使湖北的考古工作取得更加丰硕的成果,达到更高的水平,为全面复原湖北地区古代人类社会历史的目标而奋斗。

我国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曾精辟指出:“21 世纪的中国考古学,将是世界性的中国考古学。”严文明先生认为:“中国考古学走向 21 世纪的过程,也将是走向现代化和走向世界的过程。”湖北考古工作是中国考古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只有明确 21 世纪中国考古学的方向,才能更好地搞好湖北的考古工作。

1. 要不断完善考古学的理论和方法 只有在正确的考古学理论和方法的指导下,我们的考古事业才能迅速的发展,湖北 50 年的考古工作实践就是一个典型的例证。湖北省考古工作第一二阶段,由于忙于配合工程进行田野发掘,缺乏考古学理论与方法指导,发展不快。第三阶段,虽然也忙于配合众多的大工程进行田野发掘,但在苏秉琦先生区系类型的理论和方法指导下,加强研究工作,发展较快。例如新石器时代已建立了考古学文化发展系列,并对考古学文化的分期、类型、文化内涵与关系进行了深入研究,取得了可喜的成果。1991 年苏秉琦先生在《关于重建中国史前思考》一文中指出:“考古学的最终任务是复原古代历史的本来面目。”全面复原古代人类社会历史的目标,是 21 世纪考古工作者的神圣职责。为了达到这个目标,我们必须努力学习国内外的考古学理论和方法,勇于在实践中创新,并不断完善。只有这样坚持不懈地努力完善考古学理论和方法,我们才能更快地达到这个目标。

2. 大力加强课题研究 中国是发展中的国家,在改革开放的大好形势下经济建设将蓬勃发展。因此,配合基本建设开展考古工作,不是短暂的行为,而是长期的任务。从目前的情况看,21 世纪湖北境内的大型建设项目非常多,如何在配合基本建设工程中围绕学术课题开展考古工作,也将是长期任务。湖北地区的各个时期文化发展并不平衡,各地的学术课题也不完

全一样。在配合建设工程中应根据各地的实际情况选择课题,以加快考古学科的发展。湖北50年的考古工作,课题的研究虽取得不少成果,但还远远不够,需要进一步加强研究。旧石器时代,在鄂西、鄂西北地区虽已发现100多万年前直立人化石,但比非洲地区的古人类化石年代晚;今后必须在这些地区开展专题调查,为解决学术问题而有计划地作些主动性发掘,继续探索人类起源这个世界性的重要课题。湖北已发现早、中、晚三个时期数以万计的石制品,但缺乏研究;今后应对这些石制品进行全面系统的研究,并与周边石制品进行对比研究。目前已知城背溪文化的年代距今为七八千年,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尚有缺环,应加大寻找早期文化的力度。城背溪文化和屈家岭文化的遗存中都发现水稻等农作物,但年代偏晚;随着寻找早期文化工作的开展,也应注意这个问题,以加强农业起源课题的研究。目前湖北境内的新石器时代文化类型较多,各个文化之间的关系,以及与周边文化的关系尚需进一步研究。以古城为中心的聚落形态研究工作虽已起步,但还远远不够;今后应为解决学术问题有计划地做些主动性发掘,进一步探索文明起源及湖北在中国文明进程中的地位和作用。商周时期,中原地区建立夏、商、周王朝后,夏文化、商文化、周文化曾对湖北的土著文化产生了深刻影响,而且中原文化与土著文化还发生了此消彼长的历程,目前的考古资料已露端倪,但并不十分清楚,需要进一步做工作。商代早期的盘龙城遗址,需要进行全面考古勘探,弄清城内布局;对城垣也需继续解剖,解决建城与沿用的年代问题;对城外要进行全面调查,弄清当时贵族墓地等方面的分布情况。大冶铜绿山古矿冶遗址的发掘,是我国考古史上的一次重大发现。今后应对大冶、阳新的古矿冶遗址组织专题调查,并对古矿冶课题做更深入的研究。随州曾侯乙墓的发掘曾引起中外学者的关注,但关于曾随关系、曾楚关系,以及曾都在何处等问题,均需进一步探讨。楚文化的发现与研究,虽然已取得重要成就,但广度与深度还不够。今后应加强早期楚文化的探索,了解西周早、中期楚国的兴起及发展历程;对楚国春秋晚期以前的都城,也需进一步探讨;目前春秋战国时期的楚文化的资料积累较多,尤其是楚简、丝织品、漆器等等,今后应分专题、组织多学科联合进行深入研究,达到以考古资料与历史文献相结合重新编写楚国历史。秦汉以后,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和发展时期。湖北地区着重研究各个历史时期在大一统的文化中的地方特点,并对较突出的课题进行研究。例如秦汉时期发现大批内容丰富的简牍,是不可多得的文献资料,目前虽已初步研究,但还远远不够,今后应加强研究的力度。湖北出土大批精美的秦汉漆器,六朝时期的武昌城,六朝佛教造像,六朝武昌铸镜,六朝与宋代瓷窑等方面的课题,均需进一步研究。我们的研究课题更加广泛而深入,才能达到全面恢复湖北历史的目标,也才能不断地走向世界。

3. 加大科技考古的力度 科技考古的内容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对古代科学技术的研究,二是现代科学技术在考古研究上的应用。过去我省也做了一些努力,例如曾侯乙墓发掘后,邀请冶金、纺织、音乐、天文、古文字等方面的专家参加研究,提高了发掘报告编写的研究水平。在一些大遗址与墓葬考古调查、发掘中,运用遥感、航拍等探测技术、各种测年技术、成分分析等。在三峡库区工程发掘中采取古DNA提取和研究、孢子花粉、古代地理研究、成分分析等。但是,这些工作并不全面、不系统。21世纪是人类高科技迅速发展的时代,我们只有在田野发掘与课题研究中,加大科技考古的力度,才能获得更多的历史信息,全面复原湖北古人代人类社会历史才不致于成为一句空话,也才能实现考古现代化,使湖北的考古走向世界。

4. 加强省内外的合作,努力开拓与各国的学术交流 湖北省的田野发掘工作,曾得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各兄弟省市、各大院校的大力支持;考古研究方面,也与湖南、河南、安徽共同研究楚文化。在对外学术交流方面,曾多次派专业人员出国访问,并与美国、日本、法国等共同发

掘遗址或开展专题研究工作。但是,围绕学术课题与兄弟省市合作较少,今后在三峡工作库区考古工作中,应与重庆市合作研究巴文化与巴楚文化关系。湖北位于中国中部,是南北文化交流与东西文化交流的枢纽,各个时期与周邻地区的文化关系密切,也应为解决考古研究课题而与兄弟省市加强合作。21 世纪的中国考古学将走向世界,理应加强对外学术交流,使世界了解湖北,也使湖北了解世界。

5. 加强人才培养 人们常说 21 世纪的竞争,是人才的竞争。21 世纪湖北的考古工作,同样必须依靠一支有较高水平的考古队伍。一个省级的考古研究所,必须有各方面的研究人才。培训人才,是新世纪考古事业发展的需要。因此,必须制定人才培养规划,并采取有力措施,使各方面的人才较快成长,才能完成我们考古工作的最终目标。

6. 切实做好大遗址的文物保护工作 为了中国考古学健康持续地发展,必须切实地做好各个时期大遗址的文物保护工作。21 世纪是我们伟大祖国更加繁荣昌盛的世纪,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必然造成文物破坏,如何在经济建设中采取有力的措施,将文物损失降低到最小的程度,也是每个考古者的神圣职责。

湖北郧县曲远河口人类颅骨的形态特征及其在人类演化中的位置

李天元 王正华 李文森 冯小波 武仙竹

湖北省地处长江中游,西部接邻四川盆地,西北部与陕西汉中盆地相连通,北部与河南南阳盆地沟通,腹地为江汉平原。地貌类型多变,自然环境宜人,很适合于远古人类生存。在这片土地上,古人类化石地点分布很密集,四川万县(今万州市)发现有巫山猿人。陕西蓝田公王岭和陈家窝发现有蓝田猿人。河南南召发现直立人牙齿。湖北郧县梅铺龙骨洞和郧西安家白龙洞相继发现过猿人牙齿。湖北建始高坪龙骨洞发现有步氏巨猿牙齿,同时发现4枚高等灵长类牙齿,有人认为是“南方古猿”,有人认为更有可能是时代较早的直立人。这些珍贵的人类化石材料为在这一地区寻找远古人类的遗骸和遗物提供了更广泛的线索。

1989年5月,郧县博物馆王正华等人在文物调查时从郧县青曲镇弥陀寺村曲远河口学堂梁子上发现一具基本完整的人类颅骨化石(编号EV9001)。次年6月,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与郧阳地区博物馆、郧县博物馆联合组成考古队对学堂梁子进行考古发掘,又获得一具更为完整的人类颅骨化石(编号EV9002)。这两具颅骨化石出自同一地层,形态基本一致,同属直立人类型,称之为“郧县人”。

一、地层和时代

郧县位于汉水中游上段。曲远河口在郧县城关上游约40km处。学堂梁子是汉水北岸的四级阶地,顶部距汉江水面约50m。暴露的堆积物剖面厚度约18m,自上而下有13小层,可分为上、下两段:上段(1~6层)为土状堆积,厚约8m;下段(7~13层)为砂和砾石交互层,为古河湖相沉积物,厚约10m。这套堆积物直接叠压在基岩上。

郧县人颅骨化石发现于第3层,EV9001发现于该层上部,EV9002发现于该层下部。二者的水平距离为3.3m,垂直距离仅0.35m。

在第3,4,5层中均发现有丰富的哺乳动物化石,埋藏情况略有不同。第3层为浅褐色砂质粘土,层中有胶结坚硬的钙质结核物,化石均被结核物所包裹,相互交连,呈树枝状分布。第4层为黄褐色砂质土,结构较松散,化石多单件埋藏,粘附有坚硬的胶结物。第5层为细砂土,结构疏松。化石呈片状分布,且关节相连或多节脊椎相连的标本比较多见,说明是连同软组织一起埋藏的,石化过程中没有经过外力搬运。三层堆积物是连续沉积的,土质土色是逐渐变化的,中间没有明显的界线。从三层堆积物中发现的哺乳动物化石种类还看不出有明显的时代差异。我们将所有成员视为与郧县人伴生的动物群体。

已经修理和鉴定出的哺乳动物化石有18个属种,随着发掘工作的开展,不断修理出新的标本,还会陆续发现新的属种。就目前已知属种的群体组合来看,主要显示南方动物群的性